**从《资治通鉴》浅析司马光的民族观与外交观**

刘沛雨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21级 2100012289

**摘要：**纵观古今，中国大部分时间都巍然屹立在世界文明之林，并且凭借着独特的语言文字使中华文明一脉相承。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1]](#footnote-1)”可见在华夏民族自信从容之源远流长。作为《左传》的忠实拥趸、儒学的守护人，司马光对于中华文化的自信在《资治通鉴》（后文中简称《通鉴》）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文将通过《通鉴》及其他相关资料中有关对外交往的具体章节，分析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古人的民族观与外交观；探究这些观念对于民族心理的影响；并讨论司马光的民族与外交思想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做到古为今用。

**关键词：**《资治通鉴》；司马光；外交观；民族观；夷夏。

**一、《资治通鉴》中的民族观与外交观**

谈及“夷夏”与“外交”，首先需要明确界定何为夷何为夏，何为内何为外。“夷”指汉族周边的少数民族，“夏”为汉族的别称； “内”在分裂时期（如春秋战国）指某一国国内，在大一统时期（如秦汉唐）则指中原主要王朝的疆域以内；与之相对则有“外”的定义。

《通鉴》的民族观可以概括为“轻夷重夏”，总体上继承了由儒家提出的“夷夏之辨”的“天下”体系；而外交观则蕴含了司马光的许多政治主张。所谓“天下”体系，简单来说就是以天子为核心，以地域范围为坐标向四周辐射的国家观。在一个国家中，天子至高无上，王畿次之，诸侯国又次之……这样一来，远离中原王朝且未经中原文化同化的少数民族自然成为了夷狄。司马光虽然继承了儒家传统，但是其夷夏观也在儒学基础上有所变通，认为夷人“虽禽兽木石，亦将感动，况其人类[[2]](#footnote-2)”，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夷夏一家”的整体统一。而司马光的外交观则深刻反映了其稳健务实的政治风格，认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应当采取的外交政策也有所不同。

以下将选取两个例子，简要阐明司马光的民族观与外交观。

1. 秦国略蜀[[3]](#footnote-3)

“五年，巴、蜀相攻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犹豫未能决。……王从错计，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4]](#footnote-4)”

该篇讲述了秦国攻略蜀地的经过。巴、蜀两国战争，都来向秦国求援，而秦国也面临着韩国来犯。主张“得蜀即得楚”的司马错力主秦惠王伐蜀，而主张“挟天子以令于天下”的张仪则认为不应与戎狄小族争斗，而应征讨韩国进而控制周天子。而后作者主要记录了司马错的观点，应当注意到，司马错称蜀为“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只此一句便从地理与礼乐秩序上否定了蜀国的合法性——蜀国不仅远离周天子，属于夷族，也不得民心，有亡国之兆。因此占领蜀地“天下不以为暴”，外交上“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实为一举两得；而伐韩则是破坏礼法，招致天下声讨的不义之举。而后对于伐蜀结果的记述（见上）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于司马错观点的认同。

该篇反映了分裂时期夷夏交往与中原主要国家交往的差别。伐蜀与伐韩本质上都是攻击敌对国家，但是在“夷夏之辩”思想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与华夏民族的交往是不平等的，攻打七国之一的韩国是不义之举而攻打处在蛮荒之地的蜀国便是“禁暴止乱”。而作者对这一说法的支持也表明作者认同夷夏之别高于国家之别，汉文化圈内的国家尽管交恶也无时不受礼法的约束，而对于汉文化圈外的国家则可以肆意兼并占领。由此可见汉文化圈有着比较强的排他性，圈内讲究谦让与和睦，而圈外则表现出对于自身文化的自信乃至自傲。圈里圈外，谦逊与傲慢同时被根植在华夏文明的基因之中。

综上所述，《通鉴》外交观中的外交对象应当是尊崇礼法的国家，对于多行不义的不仁之国则可以贬为蛮夷。而对于蛮夷的态度则是夏重而夷轻，不应与尚未开化之国交往。并且外交中也应时刻注意维护自身利益，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对外政策。

1. 唐灭高昌[[5]](#footnote-5)

“高昌王麹文泰多遏绝西域朝贡，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内属，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上遣民部尚书唐俭、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赍缯帛赐薛延陀，与谋进取。”[[6]](#footnote-6)

此处记叙了唐讨伐高昌的原因，罗列了高昌王麴文泰的六大罪状：

1. 遏绝西域国家朝贡唐朝
2. 与西突厥合力攻打唐朝属国伊吾国
3. 不听圣旨，拒绝遣大臣阿史那矩入朝议事
4. 扣留流亡高昌的中原人
5. 不敬唐朝使者，大放厥词
6. 离间邻国（薛延陀）与唐朝的关系

唐太宗三令五申，先是“下书切责”，而后又遣使者前往高昌国问状。可见

出兵讨伐高昌王已是再三忍耐后的无奈之举，可谓是先礼后兵，仁至义尽。与上一例秦国略蜀相比，这里作者着重强调了唐太宗在决定出兵前的宽大怀柔，体现了其以德服人，怀柔德化的民族政策，表现出对唐朝以礼对待周边小国的肯定。在正式出兵前，“上犹冀高昌王文泰悔过，复下玺书，示以祸福，征之入朝”，麴文泰称疾不至后才正式出兵，明确了“师出有名”的战争正义性。

“军至柳谷，诇者言文泰刻日将葬，国人咸集于彼，诸将请袭之……以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夜，趋其都城，高昌逆战而败。大军继至，抵其城下。”[[7]](#footnote-7)

本段描述的唐军进军高昌的过程，麴文泰听闻唐朝出兵发疾而死，在葬礼进行时诸将请求偷袭葬地，没有得到允许，原因是“天子以高昌无礼，故使吾讨之，今袭人于墟墓之间，非问罪之师也”，明确天子发动战争是为了兴师问罪而非攻城略地，维护了正义性。最终，唐灭高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综合上述两例，我们可以大致得到司马光的民族观与外交观。民族上强调华夏民族的正统性与先进性，其他民族应当臣服于华夏并且遵循礼法——这是华夏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进行和平交往的前提。外交上则强调应遵循礼法，以和为贵，即使发动战争也应师出有名，维护伦理道德。

客观来看，其观念有其历史局限性。其过于注意本民族形象，没有认识到民族关系与政治经济实力的密切联系，而把民族交往理解为人际交往，夸大了德化作用和维护和平的意义；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战争的斗争性，盲目批判战争中一些计谋的运用（如《通鉴》司马光对于傅介子诱杀楼兰王的评价“且以大汉之强而为盗贼之谋于蛮夷，不亦可羞哉！[[8]](#footnote-8)”），将自己民族的伦理道德加诸民族战争，把民族事务伦理化，导致了对战争根源的错误认识和对德化作用的夸大[[9]](#footnote-9)。

**二、传统民族观对民族心理的影响**

通过前文对司马光民族观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来源于儒家“夷夏之辨”的民族思想，代表着中国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民族观念。其强调华夏民族礼法秩序的先进性，并认为应以此为依据约束其他民族，却没有意识到民族关系本质上由民族间的生产力差距决定。

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以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先进的生产力等为依靠。但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礼乐制度——即政治、文化上的重要性一直被古代文人知识分子过度强调，以至于其他的一些方面（尤其是科技）被长期忽视，最终导致了一叶障目式的片面自信——只看到国家发达的政治制度与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而忽略了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的落后，导致了生产力水平迅速被西方在工业革命中超越，最终才有近代屈辱的外交史。可见，“夷夏之辨”民族观使得民族的自信心理走向了过分膨胀并最终化为虚无；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中长期以来的民族自信心也赋予了中华民族理性的批判精神，这一点在司马光个人上便有所体现。

宋神宗时期，北宋曾帮助西夏平定内乱，北宋边将趁机夺取了西夏的边地。在司马光看来，这种做法是趁火打劫、背信弃义的。他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现实，因此追求理性与客观。北宋作为大一统王朝，理当承继正统，维护礼仪道德，不应趁人之危，贪图区区小利。对于国家民族深厚实力与底蕴的自信使得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家学者能够进行自我反思。对于战争的态度，他们追求师出有名、胜之有道；如果胜之不武，就算获得了西夏边地，也是“虽有米脂千寨也于事无益[[10]](#footnote-10)”。其重视战争的道义基础，反对轻启战端，表现出理性的自我批判。敢于自我批评而不自吹自擂，恰恰从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对于自身实力的高度自信。自信而不自傲、以理服人而非恃强凌弱，这是司马光希望通过《通鉴》传递给后人的民族观。

**三、《资治通鉴》外交与民族思想在当代的运用**

以史为镜，鉴往昔而知来者。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通鉴》的外交观中正确的一面——根据国家的实力制定不同外交方针，坚持原则，不卑不亢；不做出违背国际政治原则的行为，掌握舆论的正义性。也应认识到《通鉴》中对于战争认识的历史局限性。战争并非伦理道德事务，是政治与外交的延续，是矛盾的最高形式。“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11]](#footnote-11)”一味讲求“和为贵”而姑息迁就战争策源者只会招致敌人更猛烈的进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们既应该发扬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文化基因，也应加强国力建设，提升国际话语权，为民族自信心提供有力后盾。以上便是通过分析《通鉴》中民族与外交思想得到的经验教训。

1.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 [↑](#footnote-ref-1)
2. 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六》。 [↑](#footnote-ref-2)
3. 注：题目为编者所起。 [↑](#footnote-ref-3)
4.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周纪三·慎靓王五年》。 [↑](#footnote-ref-4)
5. 注：题目为编者所起。 [↑](#footnote-ref-5)
6.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贞观十三年》。 [↑](#footnote-ref-6)
7.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贞观十四年》。 [↑](#footnote-ref-7)
8.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汉纪十五·元凤四年》。 [↑](#footnote-ref-8)
9. 崔凡芝，萧淑贞：《略论司马光的民族思想》，《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 [↑](#footnote-ref-9)
10. 《司马光奏议·论西夏札子》，第380页。 [↑](#footnote-ref-10)
11.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章。 [↑](#footnote-ref-11)